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 电影创作为什么要注重基本人性塑造

■文/赵军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需要知道自己的使命,因为正在成为社会文明新人的十多亿中国人民在看着我们,国家政府面对现代城市文明建设的无数问题在等着我们,五千年民族的血脉和全世界人民能否接受一个新民族诞生的挑战在考验我们。一个从农业文明脱颖而出的现代城市文明中国,眼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回答一个文明结构转变过程需要注意那几十条军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社会经历了那么漫长的熟人社会,人们淡薄于树立独立人格、坚守诚信底线。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将生存资源的攫取放在首位,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早已有了久经证明的共识,它就是民间及社会上早已习惯于用熟人社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规则,传统伦理的规则,打造自己的生存资源环境,这样一种使用资源的方式在一个熟人社会被视为天然合理。

当着这一切瞬间失去的时候,当着人意识到有一天自己的生存资源会被剥夺殆尽的时候,更有甚者当生存资源必须借用新的信用条件得到,而这些条件的确立尚没有法律依凭的时候,当人们因为不受充分的法制条件约束而有着自己比较充分的行为自主权利的时候,一句话,在熟人社会文明消失而生人社会文明远来未及完善的时候,人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放弃人性、放弃信仰、放弃信用,放弃深埋在这些当中的敬畏而想方设法巧取豪夺的。

所有的造假、破坏环境、贪腐、寻租、黑社会行为、恶意违约、黄赌毒、暴力强拆、欺行霸市、坑蒙拐骗,乃至贩卖儿童、犯罪杀人等等,都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负面清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揭露的流氓无产阶级形态指的正是这样一种既赢得自由但又没有确切生存资源的人们的状况。这个过渡时期在从农业文明急速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中国当下,在相当大的人群当中,则表现为无底线、无信用、无人性“三无”状态。

基本人性的提出仅仅是着眼在基本两个字上,也许这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最低级的要求,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在生存资源的获取正在完善其正义程序的历史阶段,我们痛感基本人性在社会某些角落坠落当中,社会生活的压抑和心灵的痛苦也发生在无法感受得到基本人性的黑暗当中。

在社会转型的漫长时期中,如何逐步过渡到以信用文明和生存资源全社会保障的阶段,其中保持并弘扬基本人性,让基本人性成为新社会成长的基石,譬如仁者爱人、尊重人格、珍惜他人生命、关爱弱者、注重亲情、保持职业操守等等,就必然地要作为社交信用而进入整个过渡时期的全社会共识。

现在需要的就是全社会的基本人性共识和基本人性气场,这个根本有了,就和政治上的根本巩固了一样,很多专项工作的进行就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基本人性是一个社会得到全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它就可以成为城市文明的基本信用基础。在生人社会的一切有关生存资源的信条逐步建立起来的漫长时期里,再没有比基本人性的存在与传递对于我们更能感觉到满足了。

最适合于培育基本人性、宣扬基本人性、传递基本人性的载体是文化,是电影。文化领域不会没有意识形态宣传,不会没有传统历史教育,但是在基本人性的传播上确实有着很多的空间。一个民族有这样的气魄开辟一个伟大文明转型的历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史诗性的创举,而伟大文明的转型只能是让这个民族成为更杰出的优秀种群,而非没有人性的动物。人类社会应该就是人性社会,而且应该是人性最高标准的社会。

在四十年前开始这个文明的伟大转型开始之时,我们以为生活中缺少的是生存资源,四十年后生存资源问题我们以为解决了,但是它

又从资源分配差距和利益基本保障的角度向社会提出新的挑战。四十年前生存资源问题发生在农业文明状态下,而今天生存资源问题却发生在当代城市文明创造的初始。这个问题年轻人、产业团体、小家庭、城乡二元家庭、下岗工人群体等等存在,官场、商场、职场同样不落。它是上述各种问题的概括,是全部转型期中对利益目标的期望值破灭必然引起的个体和小团体的压力,包括压力造成的精神变态。

中国电影自觉完成传递基本人性如此需要认真思考,同时作为电影工作者也是很基本的任务,反而是社会比较容易切入的一个大众传播的端口。电影既可以从歌颂人性美的角度也可以从揭露人性罪恶的角度,既可以从大人物、大场景的题材也可以从小人物、小角度的场景,既可以从类型片中设计也可以在另类型片中挖掘。新城市文明下的社会形态产生着以往没有的大众传播媒体及全媒体,社交生活令电影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交属性,社会话题已经成为电影成功的不二法门,这些都可以让电影成为传播基本人性的最佳途径。

基本人性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恰恰是基本文明和基本信用价值。传递基本人性于电影创作当中,需要电影人更加自觉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精神劳作。在诸多的社会转型问题中,价值管理起着力挽狂澜的作用。不论写的是伟大壮举,还是身边小事,我们就问这个主人公如此这般究竟为何?为何他舍身就义?为何他跌落深渊?为何他一如既往?为何他畏葸退缩?等等。

人物的行为总是由动机支撑的,也许真实生活中人物并不执着于人性的沉重,但是作品可以从基本人性立意,以此作为编导的立场和觉悟。我们自然不期望于一部电影就能够改造当代社会的文明状况,但我们期望于无数部电影一起来赋予社会生活更多的人性温度。如何更加艺术的灌入人性温度自然是另一篇文章的立意和取材,面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压力和现实已经发生的社会生活基本人性的缺失,我们谨在此提倡在当代电影的所有创作中,注入基本人性,注入社会诚信,注入独立人格。

电影要和时代一同进步,电影更要为不经意的历史发展存留精神丰碑。传奇、神奇、悲剧、喜感、悬疑、动作、场面和追逐等都能创作成功的市场电影,但是唯有传播基本人性的电影才真的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所需要的。

中国很快就会走完新城市文明外在的路程,城市人口很快就会超过80%、90%。这时社会问题会更多,因为当代城市文明的价值观再造会远远没有实现,当代城市文明需要的陌生人社会秩序也会因为社会信用不足而迟到。这些就是内在的路程。城市生活必需的人性温度何在?社会伦理的现实基础何在?电影在造就精神残疾的观众人群吗?就算橱窗里琳琅满目,社会还是会生出更多冰冷的角落。

正如在这个当代城市文明社会中我们每一天都在忙着这样那样的个人认证,现在我们应该承认,保留下更多,或者挖掘出更多涉及基本人性的故事、人物、情节和细节,触及人们的情感,打动观众的心灵,从而创作出真正的时代史诗,能够这样追求电影深度的编导,就是在给自身做着一位伟大电影艺术家的如此认证。

电影人、文化人需要一同来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文明及文化变革。看一个国家的变化有十年的角度,有五十年的角度,更有一百年甚至五千年的角度。这就是中国的角度。电影不是能够承担跨越国家的历史性载体,但是基本人性的探索 and 重建是永恒的。它在今天的意义于电影而言正好是两个角度,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梦不能缺少基本人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能没有了基本人性,这个话题不仅属于电影,只是很应该属于当下中国电影。

看《如影随心》仿佛看一场拔河,类王家卫风格与安顿的原著各执一端奋力相搏,导演霍建起作为裁判站在中间,竭力不使一方压倒一方,维系着这场较量的平衡。这个过程中令人纠结,王家卫风格的存在,官场、商场、职场同样不落。它是上述各种问题的概括,是全部转型期中对利益目标的期望值破灭必然引起的个体和小团体的压力,包括压力造成的精神变态。

先来介绍角力的一方——类王家卫风格,有一些时刻《如影随心》会让人不由自主想到王家卫,画面美得令人心颤,而且相由心生,银幕上红与绿的纠结,正暗合女主角曾经狂热继而冷却的爱情,杜鹃和陈晓美得出离真实的大特写,仿佛重庆大厦里金发青霞、清雅阿武昔日重现。清冷悠远、神秘疏离、茕茕独立的杜鹃真的太王家卫了,故事的叙述主视角是杜鹃饰演的女主角自述,杜鹃吃语式的独白衬着梦幻光影格镜头里独行踽踽的她,“遇上他那一刻,我们翅膀钩住了翅膀,彼此纠缠,顷刻沉沦”,“折磨自己,或者折磨对方,否则不是爱情”,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在看王家卫的错觉。

但故事的核心来自那个一点都不王家卫的安顿,记者出身的安顿的国人情感实录,最大的力量就是当事人亲述,当事人平实而不华美的自述里有丰富的细节,有事后的反思,有痛定思痛的自省,也有仍执迷局中的受限与无法置换的自我立场,这一切构成了那个活生生的讲述人。人,永远是最有趣的,

# 从春节档影片盗版现象谈电影版权保护

■文/杨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电影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电影产业发展迅速,影片质量和数量持续提升,全国电影票房屡创新高,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高达609亿元。但在市场高度繁荣的背后,影片盗版现象日益严重,盗版形式日趋多样,成为电影权利人无法避开的雷区,每一个重要档期,每一部爆款电影,都会伴随着影片被盗版,版权方发声声明、发律师函,但下一次依然被盗版,循环往复。如何更好的保护电影版权,有效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已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电影盗版现象在2019年春节档尤为猖獗。今年春节档被称为“史上最最强春节档”,集结了我国首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黄渤+沈腾”组合《疯狂外星人》、周星驰强势回归IP《新喜剧之王》、韩寒自传体影片《飞驰人生》、预告片暖心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国产动漫精品《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各类吸睛影片,春节档票房也再次刷新了票房纪录,取得57.84亿元的可喜成绩。在影院票房取得新高的同时,影片盗版资源也可谓取得“突破”,春节档的几部热门影片上映仅两天就在网上公然被叫卖高清图,1元一部高清图资源,2-5元多部打包出售,微信群有人用盗版资源链接“拜年”,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最严重的一次盗版事件。

电影盗版本是非法行为,但这种非法行为已逐渐从单兵作战发展为完整产业链,从片源盗取到包装再到资源分发每个环节都有严格分工,甚至可以视频进行压缩或加工,添加广告。而盗版链接的网站服务器则建在其他国家,以规避监管和制裁。就销售渠道而言,盗版影片采取多级分销的模式,吸收大

量社会人员加入销售大军,通过各种渠道大肆传播,传播人员可发展下线,不仅可以从自身的销售业绩中提成,还可以从下线的销售收入中获得提成。这种传播模式用户分散,不易监管,增大了遏制盗版和维权的难度。大量盗版在网上传播,对市场环境和电影票房都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尽管盗版电影对每一部影片票房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对整体电影票房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以《流浪地球》为例,上映之初,猫眼对流浪地球的预期票房一度高达53.72亿元,但网络盗版的流出导致该片预期票房的下滑,该影片仅网络盗版观看数量超过2000万次,按照单张票价45元计算,保守估计票房损失9亿元,这还仅仅是网络点击量,未包含点对点传输下载。由此可见,盗版对电影票房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为了打击电影盗版行为,更好地保护春节档重点影片版权,国家版权局提前部署影片版权保护工作,在2019年2月2日就对外发布《2019年第一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名单涵盖《流浪地球》等8部春节档国产电影,要求各平台(包括提供内容、存储、搜索链接、电商网站、应用程序等各类网络服务商)均应对名单内院线电影资源的传播进行严格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处理和阻断盗版侵权行为。影片上映后,国家版权局部署专业监测机构加大影片盗版监测力度,多渠道多平台搜集各类侵权线索,与权利人建立高效对接窗口,督导网络服务商快速处理侵权信息。后期更是在网上发布微博号召观众举报侵权线索,国家版权局的“剑网”行动为春节档电影版权保护起到了

# 《如影随心》：王家卫、安顿难以得兼

■文/周舟

这才是安顿作品的力量之源。

《如影随心》的故事源于安顿的一篇短文《曾经的外遇,永远的同谋》,但已改得面目全非,毕竟原著容量太小,而且发表于十多年前。原著里男女主角都来自教育系统,女方是打卡上班的行政人员,男方是副教授,两人都已婚已育,婚姻当然最好,退一步给我任何一个都OK,但被拉锯的麻绳反复揉搓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两头都没落着,很伤很受挫。

才发现曾令人欣喜不已的“新大陆”一旦开始开工建设,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旧大陆”的老路。

将这样一篇静态的采访实录变成一部电影,诚如霍建起在访谈中所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可视化,于是男女主角的职业变了,坐办公室的教育从业者天然的被判定为缺乏视觉元素,取而代之的是拉小提琴的陈晓和做室内设计的杜鹃,嗯,音乐家和画家的恋爱,视听元素确实饱满了,可同时原著的情感核心也动摇了,原著中两人之所以那么飞蛾扑火抛家弃子地奔向对方,就是认定自己奔向的是“此生最壮烈的浪漫”,他们的奔爱之旅,其实是逃离平凡、压抑、一成不变的庸常,才会产生巨大的失落与虚空的危机,但内核其实藏着普适的人性之困。

霍建起和安顿之前曾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情人结》,《情人结》的原著《爱恨情仇》叙述虽极简,但是男女主角近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注定了故事拥有

一颗非常有力的戏剧核,莎翁笔下最经典的爱情,怎么改写都有戏。相形之下,这次《如影随心》的改编难度要大得多,原著里男女主角走出围城之后的失落与倦怠,两个偷情的同盟如何建立对彼此情感忠诚度的信任,虽然安顿已经给出了故事的主题与核心,但只停留在一种反思的陈述,要成为一部90分钟的电影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重建戏剧核,铺陈层层递进的戏剧结构。

可能是从戏剧的角度考量,影片的着力点没有放在狂热蜕变为倦怠,而放在两个偷情前科者之间的难以信任,曾经的共谋者现在成了对手,都熟悉对方作案手法的他们,能全心信任对方吗?他说的加班真的是加班吗?她按掉的电话真的是垃圾广告吗?看一对情侣心魔暗生,由相爱变成相互折磨、相互伤害,这个过程又有趣又残忍。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以心理结构的故事,它的戏剧动作必然是茶杯风波式的,一个眼神的变化一个语气的不同,不仔细看可能都察觉不出的差异,在爱人的心里已然楚河汉界、天崩地裂,参见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及简·奥斯汀小说成功的电影改编。

《如影随心》的处理太流于可视化了,该做小动作的地方全变成了大的戏剧动作,为了制造男女主角的危机,其次在影片上映前向各大平台发出声明影片版权归属,再次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在上映期间进行网络监测,对于网络侵权盗版行为采取取证、阻断等措施,降低侵权损害。同时,各大片方提供多个侵权线索举报渠道,便于观众能够将发现的盗版侵权行为进行反馈。今年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廉政风云》、《熊出没:原始时代》联合发布维权声明,向涉嫌盗版的“麻花影视”发送律师函,敦促对方停止侵权行为,引起一波热议,麻花影视APP被广大媒体和公众诟病,相信后期版权人还会采取其他法律手段继续维护影片版权。

即便主管部门给予如此大的关注,版权人做出种种努力,影片盗版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每一部优秀影片都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智慧与汗水,是影视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如何采取有效手段保护电影版权,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不受侵害,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课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尤其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完善:

1、加强普法宣传,提高版权意识。加强对盗版影片消费端的控制,对电影观众进行有效引导,是从源头上切断影片盗版的关键环节。普通观众观看盗版影片,虽然也有电影票价高的因素,但自身版权意识不强也是重要因素。应当加大电影版权保护宣传工作力度,通过发布宣传片等方式,号召电影观众自觉抵制盗版,提高消费者的版权保护意识,才能达到反盗版目的。同时,可探索有奖举报机制,对于举报盗版侵权行为,并查证属实的,可给予适当的奖励,充分调动群众抵制盗版的积极性。

2、降低维权成本,加大处罚力度。首先建议司法机关设立更加便捷高效的电影版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以简化版权方维权程序和降低维权诉讼成本。另外,对于版权方提出的合理赔偿诉求和为维权支付的合理成本,应全部得到补偿,应加大对盗版资源的经营者、发布者、传播者以及盗版资源的储存、发布平台的处罚力度,加强版权保护的刑事处罚力度,使处罚力度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适应。

3、建立沟通渠道,提高维权效率。今年春节档,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等部门联合采取多种措施,加大侵权监测力度,及时处理影片侵权盗版行为和侵权内容,为春节档影片版权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建议今后可建立与版权方的沟通渠道,版权方可将掌握的侵权线索第一时间提供给相关行政部门,由相关部门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版权部门可将侵权证据提供给影片版权方,由版权方对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害赔偿。

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这说明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今后,政府势必会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方面采取重要措施,相信电影版权保护机制也会在有关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完善,为电影版权人的权益保护建立有效屏障,为中国电影繁荣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